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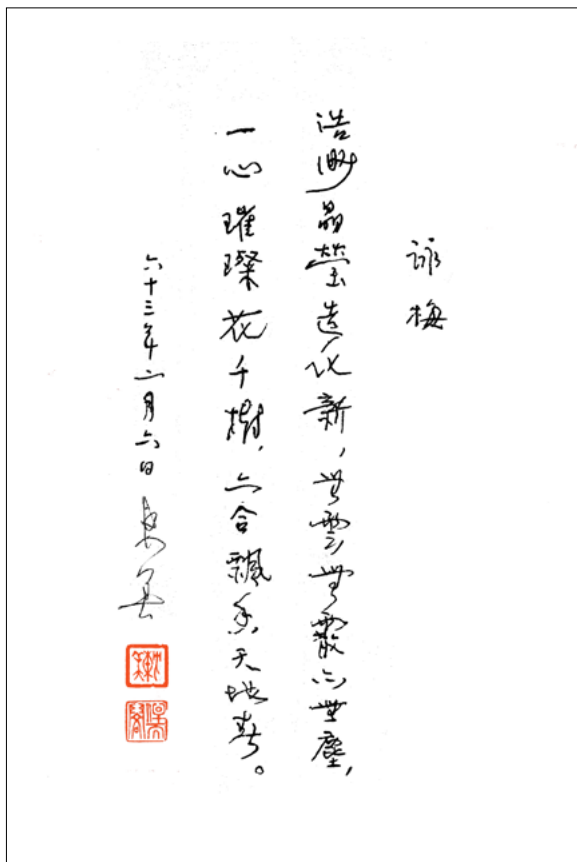
# 方東美眼中的近代文化演變

文/十方

## 一、近代大哲方東美

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是一段頗為特殊的歷史，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起始至今，在一百七十多年的時間跨度中，發生了各種各樣或大或小的變化。這些變化發生在政治、經濟、生活、教育、文化等等方面，其中一些變化的劇烈程度，甚至是中國過去幾千年來都未曾出現過的。而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中，也蘊育出了一批特殊的人物，他們大都飽學多識，歷經時局之變遷，深懷對苦難大眾的同情與救民於水火的責任感，在各自的領域內為扭轉這一時代的種種不幸而各自做著深刻地反省與努力。方東美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方東美（一八九九～一九七七），名珣，字德懷（後改為東美），安徽省桐城縣（今縱陽縣）人。他自幼熏習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在讀大學以後，又深入西方哲學之研究。一九二四年，二十五歲的方東美即已在美國通過博士學位



詠梅

浩渺晶瑩造化新，無雲無靄亦無塵，  
一心璀璨花千樹，六合飄香天地春。

二十三年六月六日 方東美



詠梅

浩渺晶瑩造化新，無雲無靄亦無塵，  
一心璀璨花千樹，六合飄香天地春。

感謝 Suncrates 提供方東美教授親筆手稿

考試，並歸國任教。一九三七年，方東美應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之邀請，以中國的人生哲學為主題，通過廣播電臺向全國大中學生先後做了八次講演，希望以我國傳統文化之偉大精神來鼓舞振奮全國之青年，與日寇作生死搏鬥，其對民族與文化的熱愛之情可見一斑。一九四八年，方東美赴台並於台大哲學系任教，此後，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在哲學研究與教書育人之中，直至一九七七年離世。

在臺灣出版的《方東美全集》中，一共收納了方東美先生的十部作品，它們分別是：《中國人生哲學》、《科學哲學與人生》、《生生之德》（論文集）、《方東美先生演講集》、《原始儒家道家哲學》、《中國大乘佛學》（上下冊）、《華嚴宗哲學》（上下冊）、《新儒家哲學十八講》、《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下冊）、《堅白精舍詩集》。值得一提的是，在方東美的一生中，由他本人親自撰寫的著作並不是很多，在這套《方東美全集》中，有一半以上是由他的學生等整理的其晚年上課時的錄音筆記。不過，這些講課記錄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他親自撰寫的著作；就中國哲學界而言，這些作品無疑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是具有極高學術參考價值的。

臺灣學者沈青松曾評價說：「現代學人中，真正貫通中

西學術的，唯方先生一人。」這句話極盡了對方東美先生的崇敬之情。事實上，這並沒有絲毫誇大方東美在近代以來學術上的地位與成就。若以中學而論，方東美自幼為受傳統的儒家家庭教育環境而成長，其國學基本功底深厚，文筆更具桐城派之遺風。從其出版之《堅白精舍詩集》來看，他還是一位頗具才情之詩人，兼有「東方詩哲」之美譽。誠然，具備國學功底與文學才情之學者在近代的歷史上亦不乏其人，但是同時具備有深厚的西方文化與哲學認識，並真正有所創見之人，就屈指可數了。而以西學來論，方東美先生對於西方哲學與思想文化之研究與運用，近代以來堪稱首屈一指。他本人親自撰寫的英文著作，不僅思想深邃，語言運用亦具備有古典英文之典雅，而這些甚至讓有些英語世界的人都自歎不如。美國著名哲學家 Lewis E.Hahn 曾由衷地讚歎道：「作為一位哲學家，東美先生不愧是體現了他自己的人格理想——集『詩人、先知與聖賢』三重複合的人格於一身。」<sup>[1]</sup>

由於某些原因，方東美先生的著作在中國大陸普及流傳的時間較晚，而學界對於他的學術身份立場之定位（如「新儒家」、「新道家」等）尚有不確定之爭執，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固然也與其淵博的學識與寬泛的治學領域有關。正如他

本人所自描的：「在家庭傳統上我是儒家，在性情契合上我是道家，在宗教啟發上我是佛教徒，但就後天訓練而言，我是一個西方人。」<sup>[2]</sup> 我們且從整體上說，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上，方東美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大哲學家。

## 二、方東美眼中的近代人類文明之演變

一個時代的變化發展是有其立體層次性而非單一平面性的。在時空的立體層次中所表現出來的，既有表層現象之變更，亦有深層內因之推動。若以思想文化之立場而言，從來都是思想觀念引導實際行動，而實踐行為又反過來驗證思想觀念。一切現實層面之現象諸如政治、經濟、生活形態、規章制度等的變動，若詳探其背後的深層原因，可以說或多或少都涉及到某種思想文化之轉變。而一個時代思想文化之形成與穩定又是一個較為長期的融合過程，它的瓦解與轉變雖然受諸多現實因素之影響，但較之現實層面的變化卻來的深沉而緩慢。不過，思想文化上的劇變之勢一旦形成，它所展現出的對各類實際現象層面上的震盪，則又顯得「威力無比」了。

近代以來的中國，無疑是正處在這樣一個思想文化劇變的關口。從鴉片戰爭以前的歷史上看，中國文化歷代以來幾乎自視為一個「自足的系統」：「在這個系統裡，不僅一切

人理建構是優於一切，而且實際的物質生活之所需也無待外求。」[3] 然而，封建傳統文化在幾千年的融合穩定中也逐漸夾雜與沉積了越來越多的腐朽與糟粕，加之後人對前人的種種誤解與錯用，導致了越來越多的文化負擔與「毒瘤」，因此而累積成為文化變動之內因。與此同時，西方科技文明的興起與發展，伴隨著資本主義堅船利炮的武力侵略，迫使中國人不得不打開國門，重新審視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中西文化之種種差異。在這樣一個時代當中，古、今、中、西之思想文化交雜而來，讓人眼花撩亂，甚至手忙腳亂，一時無法合理地抉擇。文化思想上的震動與混亂，也直接導致在短短的百年之內，政治制度、生活形態、教育方式等等不斷地變化動盪與調整，使人彷彿是生活在變亂的夾縫之中。然而，若以整個人類的思想文化發展之演變來看，以上所述的中國近代文化之變動也只是人類思想文化大轉變的一個縮影，屬於人類整體文化變動之一部分。如果要真正認清中國近代以來思想文化的種種演變，則首先必須要向上一層了解整個人類歷史發展至近代以來思想文化上的種種演化過程。

也許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方東美在比較全面地考察了人類的思想文化發展史之後，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

「從人類文化史來看，無論是希臘、印度、中國的詩人或大哲學家都曾發出同樣的論調，即歌頌讚美人類的偉大。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整個人類的文化史，卻產生了不同的景象。當然其產生伴有許多歷史條件，我們只指出幾點，依照弗洛伊德的看法，他認為人類從十七世紀起面臨著三大打擊：(一)天文學的打擊。(二)生物學的打擊。(三)心理學的打擊。這三個打擊使人覺得人類自身的渺小。」[4]

從上述的這段話中，首先可以確定方東美對於人的存在是具有偉大價值的這一觀點是持肯定之立場的，這也是他從中外先哲的資料中比較而得的一個論點。不過，此處也讓人稍有疑問，因為如果分開來詳細比較討論的話，關於人類的本性究竟是什麼以及人是否有其偉大價值等問題，在古希臘、印度等地還是有各種不同看法的。比如古希臘的奧菲斯教派（Orphic religion），認為人類的本性本來是由兩種相反的成分構成怪異組合，即善良的靈魂是深深地陷在邪惡的軀體之內的。生命直如一場牢獄，而人只有接受懲罰，並期待他世靈魂從肉體中解脫出來，方可得到真正的生命之喜悅。這些理論也成為了希臘先天性惡論的源頭，並影響產生了後來西方宗教上的性惡理論。印度的佛教哲學，也認為人本來就具備

有煩惱的種子與清淨的種子，生命乃是業習之集合。不過，從大體上看，它們雖然認為人性存在著某些缺憾，但是並不妨礙人們在價值上對於真、善、美的嚮往與追求。而且大多數認為人是可以通過實際的行為來「懺悔罪業」或發揚人性光輝的一面的，所以大多數先哲還是選擇站在人性的光明面，給予人類肯定的信心，這些在中國哲學中則表現得更加突出了。方東美的這一立場選擇也表明了其文化思想之基本立足點。

不過，方東美看到，歷史發展至近代以來，人的價值有漸趨渺小之趨勢。造成這一變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進一步地指出，主要是因為有三大文化上的變動打擊而造成了這一情況的發生：

首先是來自天文學上的打擊。方東美認為，以天文學的發展來說，自哥白尼時代以前，整個的天文學都是把地球當做為宇宙之中心。此亦即是說，人類生活在地球之上，理所當然亦即是宇宙的中心與主宰。但等到十七世紀的天文學發展以後，地球只被認為是圍繞著太陽旋轉的一顆小小的衛星，乃至整個的太陽系在宇宙的全體星系中亦如微塵一般，「是以人在廣大的宇宙中，連個灰塵的地位都談不上。」

[5] 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忽然驟降如此，豈能不讓人重新審視



自己的價值？

其次是來自生物學上的打擊。譬如在以前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總是以天地為父母，人生天地之間，頂天立地，參贊天地之化育，可說是天地之中心。而在早期希伯來宗教，乃至印度的婆羅門教中，至少也都以人是被上天所創造出來的，是從屬宇宙最高精神主宰之形象，是一切萬類之靈長，可以世代傲視於一切生物之上。而自從物種進化的觀點興起並流行之後，以人是從動物的進化演變而來，「在人的社會裡面，從圖騰社會裡面種種傳說一直到許多神話，一直到近代生物學上科學的知識，都在證明這個人類在宇宙裡面不是所謂的靈長。」<sup>[6]</sup>換言之，人類的祖先成為了禽獸，並無任何特殊性可言。方東美認為，這無疑也對人類以往的價值觀與地位感帶來了一場巨大衝擊。

再次是來自心理學上的打擊。在過去的屬於理性主義的心理學看來，人類擁有強大的意志，豐富的情感以及偉大的思想等，其中偉大的思想乃是由理性的超升而得來的。而演變至近代的科學心理學或行為心理學等之後，方東美認為，它實際上變成了一種「平面心理學」。這種「平面心理學」把人的心靈放至解剖桌上逐個分析，使之變成一種機械性的單元，然後又

拼合在一起，結果導致生命的本質的直接流失。同時，方東美也指出了弗洛伊德心理學的心理分析之方法也是有流弊的，它容易把人性分化成獸性，這樣「人不是高貴的人而是低能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各種怪模怪樣都顯現出來了。」[7]

總結上述觀點，不論是天文學、生物學亦或是心理學等，方東美眼中的近代以來人類思想文化之變動，其實都與一個主要因素有著密切的關係，那就是近代科學及其相關理論的發展。正是由於科學理論與認識的種種變化，衝擊了人類固有的思想文化認識，也改變了人類的一些傳統觀念與信仰。

而在當時的中國，國人對於真正的西方科學思想及歷史演變並不太懂得，只是知道關注一些科學技術之成果。對此，方東美「一針見血」地指出：

「從十七世紀以後的中國人，已經把中國有關科學技術的這一套歷史的演變發展老早就忘掉了，這當然同中國的教育及中國的科學制度有關，可以說已經埋葬了自己固有文化裡面的本有優點。尤其是從明末以來，經過清代將近三百年，到民國以來迄今，我們可以說一講到科學都是講科學的『尾巴主義』，不講scientific mentality（科學精神或心態）。

只曉得人家經由高度的 scientific mentality 產生出來的結果，變成科技上面的成品。」[8]

他認為，當時人們的腦筋裡根本就沒有純粹科學這一概念，所有的只是一些關於科技的知識，而這些只是屬於應用科學的末流。反映在哲學上，便是僅注重羅素與杜威的科學主義與實證主義，甚至以實證論來代表科學，對於整個西方學術的源頭與發展並不能作全面地瞭解，乃至對於理性論乃至經驗論，都無法從根本源頭上講起。所以，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幾乎被虛妄的科學主義等哲學思想所蒙蔽，甚至有一些較膚淺與低級的思想文化趁虛而入，形成了一段相當長時間的亂象，同時也影響了政治、經濟、生活等的發展。

可以說，方東美的這一認識在文化上是極為深刻與富有預見性的。在現今的中國乃至世界，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文化思想上的這一亂象。而當今的科學技術之發展，正配合現代人不知節制地消費理念與物質追求，以更加迅猛的力量把人類引導向欲望的深淵。以往人文文化所構建的寧靜和諧的精神文化生活早已式微至極。人們在盲目發展科技的同時，對於純粹科學的精神及其目的似乎早已忘卻，或者從未曾想起過。從人類的精神文明上來看，這無疑是一場巨大的浩劫。

### 三、方東美論科學與哲學

在方東美的文化演變觀中，科學技術與理論的發展與變化乃是影響近代以來思想文化變動的一個最重要因素。那麼，應該如何來看待科學與思想文化之間的關係，或者縮小範圍而具體地說，應該如何看待科學與哲學之間的關係呢？

眾所周知，在十七世紀以前，西方世界的知識分工尚不如現代一般明確，而當時的哲學還是處於一種總攝一切學科知識系統之崇高地位。等到文藝復興時期以後，各類學科知識的不斷分化，科學也漸從哲學中分化而出，取得了較為專門而獨立的地位。在近幾個世紀中，科學技術迅猛發展，而哲學之研究則顯得有些「不溫不火」，甚至出現過衰退之勢，這也導致了一些對科學的盲目崇拜與對哲學的無端「藐視」之現象的發生。方東美認為，形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基於人們的四點認識：

「（一）科學是具體的，哲學是抽象的；（二）科學是進步的，哲學是板滯的；（三）科學是批評的，哲學是武斷的；（四）科學是有實利的，哲學是不切人生的。」[9]

為了讓人更深入切實的了解科學與哲學之間的關係，方東美對於這四點認識上的誤解逐一做出了分析與反駁：

關於第一點，方東美認為，科學也不盡是具體的，而哲學也不全屬於抽象的。說科學是具體的，是因為只看到了科學方法上的觀察與實證等技術層面，這些固為不可否認之事實；然而實證科學之進步首先從數學而來，數學的發明與哲學家是無法分開的，而數學的某些部分本身也是極為抽象的，它的物件並不是實驗的事實。更進一步說，任何物質科學的推論中也都是可以找到某些抽象之步驟的。

關於第二點，方東美指出，科學之所以吸引人的地方，正在於它的不斷進步；而哲學最易受人詬病的，也就是它的迂遠性，各種爭辯論議不斷。不過，科學正是由於它的進步性，反而導致各學科都不斷出現著不確定的紛爭；哲學的問題表面上看似循環輾轉，而至今都不失其時效性，看起來似乎沒有進步，但是它的進步與不同卻是表現在過程之中的。

關於第三點，方東美反駁道，科學理論之背後常常設有一種潛在性之假定，這種假定往往是沒有意義與根據的。而哲學對於科學之假定與結果，卻是常常可以提出批評。因此不可說科學就是批評的，而哲學就是武斷的。

關於第四點，方東美辯護道，真正確定的知識都是有實

踐性的，科學與哲學都是如此。科學的發明也不是有絕對的實利，如各種侵略武器之發明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哲學也並不是不能增進人類的享受，因為人類除了物質性的享受以外，尚有精神上的幸福。

通過上述這四點的綜合辯證與分析，我們便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科學與哲學之間的種種關聯與異同了。

科學需要正確的思想文化作為其導引與評定，思想文化在某些方面也需要科學來驗證與實踐，而進一步從根本上說，思想文化與科學最終都是為了人類自身生命的存在而提供參考與服務的。在未來人類科技與文明的態勢中，我們的思想文化與科學發展應該如何「融合」起來而蘊育出一套符合新時代的發展要求的文化系統？人類的生命又應該以何種方式在未來的時代中得到安定與昇華呢？方東美指出：

「新的發展都在指正這個宇宙不可能只有一個機械的物質秩序。因為一切的轉變都是指向生命的向上發展、心靈的向上發展，然後在這重重發展裡面，我們可以看出 Emergence of Value（價值的湧現和呈露）」[10]

我們知道，在古典主義的科學思想中，至少還是堅持各種科學理論是要在於表達真理；而自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

以來，由近代的科學唯物論發展出的各種科學實證論，則認為物質世界當中只有事實而已，只是根據這些事實而產生理論，只觀察它能否與事實相符，而忽略其它比如其價值性的一面。如此一來，科學的真理性被漸漸轉化為科學的有效性，漸至出現了所謂的「價值中立主義」。而對於人文文化的研究，有很大一部分是要處理關於價值現象的問題，因此不可以用價值中立的態度來研究和建立人文文化的知識系統，否則人性將被化為物性，生命世界也必然會淪落於一種下墮的醜陋中。方東美認為，受近代科學唯物論的影響，人們只是把整個宇宙當成一個單一的物質領域；而從生命的角度而言，這個世界根本是立體而多層次的。「所以這個世界，顯然不是封閉的世界，而是一個從有限到無窮的開放世界。」<sup>[1]</sup>物質世界只是人類生命的根據與起點，從物質世界向上尚有生命世界、心靈世界……直至最高的精神世界等的不同層次。生命的價值應該是以物質世界為基礎，層層向上點化而昇華，最終契入生命精神世界的至高領域。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方東美把生命的最高領域安排在精神世界，但是他並沒有忽略物質世界的基礎性。他認為正是因為有物質世界這一「起點、根據與基礎」，方可進一

步「去弘揚生命的精神，根據物質的條件，去從事生命的活動，發現生命向上有更進一層的前途，在那個地方去追求更高的意義、更高的價值、更美的理想。這樣把建築打好了一個基礎，建立生命的據點，然後在那裡發揚心靈的精神。」

[12] 因此，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可以在人類生命的昇華中發揮作用，前提是要搞清楚它在生命世界中的定位與目的，而並非被它所牽著走。

那麼，生命在到達最高的精神領域之後，是否就意味著終點呢？方東美認為，到達最高的精神領域，還只是進行了生命「上行」的一半，而另一半則是生命的「下行」。對此，他曾在宏觀與共通性上分別以中國哲學中儒、道、釋三家的哲學思想來進行論證：

「儒家在精神文化、道德、藝術、哲學思想上面，可以把他的精神提到很高，高到一種程度，可以通透到達天，通極於天。但是儒家的思想，這麼一個超越的精神，一定還要回過頭來，貫注在現實世界上面，用儒家哲學上的一個專門名詞叫做『踐行』，把一切高尚的文化理想，轉移過來，在現實的人間世、現實的物質存在上面要能夠兌現。」[13]

「原始的道家精神，可以採取『反者，道之動』，一方面



提升他的精神到達『寥天一』的高處，那時他的哲學形而上學可以飛揚到達那麼高的境界；……因此，道家有一種高尚的精神成就，從他那個高尚的精神成就的眼光，再回顧人間世，他不但不詛咒世界，不詛咒下層的世界，即使是下層世界也在他的精神上面變成『人間天國』。」[14]

「就佛家而言，小乘佛教初起時，認為這個世界是黑暗、苦惱、罪惡；但是等到他自己精神修養一高了之後，再以下迴向的方向來俯視現實的人性，不僅僅人有佛性，而且萬物都有佛性。因此，在下迴向的方面，當初他詛咒人間世為無常、黑暗、罪惡、煩惱、痛苦，現在他都取消了，他拿最高的慈悲心來拯救世界，把這個世界從黑暗、痛苦、煩惱中變成一個精神理想的領域。」[15]

---

綜上來看，方東美所希冀建立的是一套  
有機的雙向立體文化系統，在這樣一套文化系統中，  
雖然存在不同的層次性，  
但一切都是互不妨礙而和諧共存的。  
生命層次的上級與下級之間雙向交流，  
彼此之間並不是一種矛盾的關係，而是互為增進的。

這一點也明顯克服和超越了西方哲學思想中  
二分法式思維模式的桎梏，巧妙的解決了近代以來  
受科學思想影響的物質與生命之間的隔閡問題。

---

同時，他也證明和強調了人類的生命應該是具有積極的意義與價值的，科學的進步不應該降低人類的價值與阻礙生命的發展以及對形而上的追求。這也是他對近代以來受科學影響的價值中立主義與機械因果論的一種批判。

從方東美先生對近代文化演變的分析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對於時代文化變亂的痛苦與無奈，也可以看到他對於人類生命價值之肯定與熱愛。生活在近現代這樣一個文化交變的特殊的歷史時期，方先生的對於文化演變之見識的廣博與深遠，可謂同時代同類型人物中之佼佼者。誠然，每個時代的人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方東美的文化演變觀是以他自己獨特的生命哲學做基礎的，而他的生命哲學主要還是根基對人的生命價值的肯定之基礎上，並且深受了大乘佛教哲學之影響。總的來說，他的認識來源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理解，並融合了對西方哲學與科學思想之批判，對於當前的文化發展，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 [1] 國際方東美哲學研討會執行委員會主編（1989）。《方東美先生的哲學》（5頁）。臺北市：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 [2] 方東美（2004）。中國哲學之通性與特點。《方東美先生演講集》（99-100頁）。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3] 殷海光（1992）。《中國文化的展望》（2頁）。臺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4] 方東美（2004）。教育與文化。《方東美先生演講集》（270頁）。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5] 方東美（2004）。教育與文化。《方東美先生演講集》（271頁）。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6] 方東美（2004）。當前世界思潮概要。《方東美先生演講集》（287頁）。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7] 方東美（2004）。教育與文化。《方東美先生演講集》（273頁）。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8] 方東美（1992）。《華嚴宗哲學》（122頁）。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9] 方東美（1937）。《科學哲學與人生》（3-5頁）。上海市：商務印書館。

- [10] 方東美 (1992)。《華嚴宗哲學》(126頁)。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1] 方東美 (1992)。《華嚴宗哲學》(15頁)。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2] 方東美 (2004)。中國哲學對未來世界的影響。《方東美先生演講集》(51-52頁)。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3] 方東美 (2004)。中國哲學對未來世界的影響。《方東美先生演講集》(50頁)。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4] 方東美 (2004)。中國哲學對未來世界的影響。《方東美先生演講集》(50-51頁)。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15] 方東美 (2004)。中國哲學對未來世界的影響。《方東美先生演講集》(51頁)。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尚德讀後：

智者應如方老師東美先生！

二〇一八年十月一日

於湘潭道南書院